

# “战国策派”的反动实质

马功成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西方，希特勒法西斯德国加紧侵略欧洲各国，先后占领捷克、奥国、波兰、比利时等国。在东方，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把军事主力用来对付中国共产党，而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活动。英美帝国主义为了防止日寇向它们的势力范围进攻，企图以牺牲中国来求得与日寇的妥协，实现其“远东慕尼黑”阴谋。在此情况下，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政策发生了变化，将重点由对外转向对内，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方针，制定了一整套“防共”、“限共”、“溶共”的具体政策，连续掀起了几次反共高潮，并动员了一批反动文人为他们的反共反人民和卖国投降寻找理论根据。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战国策派”这个鼓吹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团体，就是在上述情况下出现的。这批文化人于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一年在昆明创办《战国策》半月刊。稍后，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七月，又在重庆《大公报》上办了个《战国》副刊。他们自称为“战国策派”或“战国派”，在学术研究的幌子下，大肆宣扬法西斯主义，叫嚣和鼓吹侵略战争，为德国和日来法西斯侵略者张目，为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发动的反共高潮推波助

澜。他们同国内外法西斯势力密切配合，互相呼应，妄图达到否定中国人民抗战和中国革命的罪恶目的。这是当时政治思想战线上出现的一股逆流。

## 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宣传员

“战国策派”抓住抗战时期国民党策划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反动口号，挖空心思地进行所谓“解释”。他们宣称：“抗战以来，中国最有意义、最切合事实的口号，莫过于‘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他们认为这些反动口号，第一就是“战”，第二就是“国”，第三就是“策”，并且从此生发开去，充当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宣传员。

第一，他们说，要明了为什么“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因为“中国现在正处在战国时代，大战国时代只允许大战国的作风，大战国的作风只有一个战字。”<sup>①</sup>他们还说：“战不但要成为时代最显著最重要的事实，而且要积极的成为一切主要的社会行动的标准。”<sup>②</sup>在这里，“战国策派”从根本上抹杀了战争有正义的与非正义的这样一条真理，混淆了中日战争在日方是非正义的、野蛮的侵略战争，在我方是正义的、进步的反侵略战争这一重要区别。他们的用心，正如当时延安《解放日报》所指出的，“无非是要把今天人类所进行的有目的的斗争降低为盲目的厮杀，要把每一个清醒的头脑变为热昏

的疯狂，以便于受少数‘英雄’们的‘权力意志’所驱使”<sup>③</sup>。这是明目张胆地对我党领导的抗日事业进行侮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作辩护。同时，他们声嘶力竭的叫喊战争，还有一个主要意图，就是通过强调战争来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独裁政府。说什么既然“要政府有权，即不容多党存在；如容多党存在，则政府必不能有权”，甚至赤裸裸地提出“独裁国家组织适合战争，民主国家组织不适合战争”<sup>④</sup>等等。由此可见，他们强调战争不过是手段，而真正的卑鄙目的则在建立蒋介石法西斯的独裁专制统治。这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坚持抗战，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一个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新国家是针锋相对的。

第二，他们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口号下解释说：“国家之所以为国家，其他社会组织所以不能成为国家”，在于它是为“一切人群结合中唯一具有作战权的团体，有此则成国，无此则非国”。他们不仅抹煞国家是阶级矛盾的产物，而且强调不能有个人任何的民主自由，“国内一切的一切，都要置于战争这个大事业的最高总驭之下”。<sup>⑤</sup>就是说一切要服从蒋介石，要取消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妄图迫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交出抗日民主根据地和革命武装，以便能进一步加强国民党蒋介石法西斯独裁统治。

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的解放战争，为了取得抗战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发动千百万人民群众一致起来抗战。因此，党在洛川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要求全党围绕一个中心，给人民以充分的民主自由，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持久抗战的胜利。可是，以国民党蒋介石法西斯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害怕人民革命力量的壮大，害怕人民有了民主自由会起来造他们的反，不敢发动人民群众，反

而压制人民群众起来抗战。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甚至发展到公开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处制造磨擦，武装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然而“战国策派”的说客们，却大肆为蒋介石的反动行径涂脂抹粉。他们叫嚷“战时无民主”。在文化思想战线上配合国民党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喧嚣，说什么“军权之未完全统一实为今日中国之最大问题”<sup>⑥</sup>。显然这是鼓动国民党向共产党进攻，破坏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战的恶毒阴谋。

第三，他们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概括为“策”。什么“策”呢？说穿了就是蒋介石法西斯专政的反共阴谋，也就是他们为其主子出谋划策。“战国策派”的主将之一的陈铨自己就说：“决不是要求世界大同、正义、和平的意志，更不是阶级斗争、个人自由的意志”，而“应当是生存意志和权力意志”。什么叫“生存意志”和“权力意志”呢？他解释说，就是“在一种社会中间，超人和天才，有绝对发展的自由”。<sup>⑦</sup>在他们看来，那种所谓“超人和天才”，可以随意践踏多数人的权利，不惜牺牲千百万人的生命向着利己主义的目的迈进。他们为追求和达到这一“生存和权力的意志”，一切卑鄙行为都认为是正当的。“战国策派”的先生们所身体力行的正是如此。他们所谓的“力量集中”，就是要把法西斯的独裁权力集中到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手中。他们企图依靠以蒋介石为首的法西斯分子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使其“能够对于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彻底计划”，“准备长久战争”，来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占领抗日根据地，而后国民党法西斯集团完全投降日本法西斯。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 国际法西斯的走卒

“战国策派”在为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奔

走呼号的同时，还进一步为国际法西斯统治集团效劳卖命，成为国际法西斯主义者的走卒，在政治思想战线上为希特勒征服欧洲摇旗呐喊。

正当国际法西斯在欧洲横行、妄图称霸世界的时候，“战国策派”的论客们竭尽全力大肆为希特勒宣扬，把希特勒吹捧得十分肉麻。他们毫不知耻地说：“七年来希特勒以事实证明他是一外交神手，善于乘暇蹈隙，利用民主国家的裂缝”<sup>⑧</sup>，征服了欧洲许多国家。又说：“希特勒起身行伍，在上次欧战时不过一排长，如在政治上无特别的见解，定不会有今天”。甚至得意忘形的夸耀“希特勒的起来，不但近代少有其匹，即历史上也很少有这种例子。”<sup>⑨</sup>希特勒这个法西斯头子在“战国策派”的笔下，被描写成为一位了不起的“英雄”。

当然，“战国策派”也知道，仅仅在军事上政治上推崇希特勒是不够的，必须从历史方面寻找根据，给法西斯独裁政权建立理论依据，以欺骗和迷惑他们的党徒，从而达到其卑鄙的目的。因此，他们把历史上某些相类似的现象加以混淆，颠倒是非。他们创造了一个历史发展三阶段论，即封建阶段、列国阶段、大统一帝国阶段。胡说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就是这样发展过来的，现在的中国和世界也在这样发展。他们利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各国间发生战争这一事实，来比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各国的战争。说战国有“七雄”，现在世界上也有“七雄”，即英、美、德、法、日、意、中。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大发现，兴高采烈地说：“如果我们应用比较历史家的眼光来占断这个赫赫当头的时代，我们不禁要拍案举手而呼道：这时期是又一度战国时代的来临！”<sup>⑩</sup>

我们知道，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性质是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在根本性质上是迥然不同的，是有原则

性区别的。春秋战国间的战争，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走向新的统一的战争，具有鲜明的进步意义；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帝国主义之间重新分割殖民地的掠夺性的战争，是一场法西斯侵略与反法西斯侵略的战争。无论就社会性质、阶级构成、战争的目的意义和历史作用来说，都毫无相同之处。只要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这种不伦不类的比较，是怎样的无知和无耻。

“战国策派”这样歪曲和捏造历史事实的目的是什么呢？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到了战巨时代，乃有一种崭新的欲望产生——即所谓囊括四海，并吞八方之心”。<sup>⑪</sup>所以他们在文章中十分强调所谓“全体战歼灭战的最后结果，是一强吞诸国，而制造出一个大一统帝国”<sup>⑫</sup>。在这个问题上说得更露骨的，是林同济在云南国民党省党部题为《民族主义与二十世纪》的那篇演讲，他说：“结束列国纷争局面的是大一统时代。在此时期中，一个庞大的帝国兴起，包括整个文化区域。在政治，趋于专制。在经济，多少应用管制。……官僚地位的隆起，是这时期的最大事实。在一个皇帝或独裁者专制下，社会上一切人皆有摇身一变而为官僚之可能。”<sup>⑬</sup>可见，他们这批法西斯走卒，是多么迫不及待地希望建立一个大一统帝国的法西斯专制独裁政权，成为国际第五纵队，使他们能在独裁者的统治政权中，摇身一变而成为压榨人民的官僚。

那么谁能建立起一个大一统的帝国呢？他们认为德国取胜的可能性最大。因此，他们百般吹嘘德国武力如何强大，希特勒如何英明，德国的民族精神如何优越等。“战国策派”的洪思齐在《如果希特勒战胜》一文中说：“我们要指出希特勒不一定能够胜利，但的确有胜利的可能。为此，我们应当准备万一，未雨绸缪，重新考虑和各国的关系。”<sup>⑭</sup>何永佶在《龙虎斗》一文中毫不掩饰地说：“纳粹党人已扬言创建欧陆联邦”，“衡以

历史的演进律，这种举动在所必行”。<sup>①</sup>林同济也说：“莫谓这种‘大狂妄’绝对没有实现之一日，现在这个由欧洲文明扩大而成的世界文明，是充满‘浮士德精神’的，是握有一种无穷的膨涨力，无穷的追求欲的。我们‘中庸为教’的中国人，也许对这种大企图，始终难于了解，难于认真置信。尽管我们在报章杂志上跟着人家大喊，指斥某国某国包藏征服天下的野心，却是许多人的脑子后头总不肯认真相信天地间果会有这般大狂妄，更大大怀疑这般大狂妄果会有实现的可能。然而正在你我认为不可能之中，蓦地涌出一个惊人的现实。”他们还进一步捏造说：“客观条件，主观心理，已经酝酿到初步成熟，所欠的大恐是时间”。<sup>②</sup>

为了达到他们“摇身一变而为官僚”的卑鄙目的，他们大肆宣扬“世界大同只有在我们的武力统治上才能实现”，“在国与国群向大一统奋争的当儿，武力为最主要的政治条件”。<sup>③</sup>他们认为，“最辣最狠的国家，往往也是最后成功的国家”。<sup>④</sup>他们想用“直接的军事暴力”作为首要因素，来建立一个军国主义的法西斯政权的暴力统治。然而，正如革命导师恩格斯早已指出的：“军国主义将与任何其他历史现象一样，因其自身发展的结果而趋于灭亡”，“统治的和剥削的阶级，无论它拥有多少直接的暴力，总是被无情的消灭。”<sup>⑤</sup>形势的发展正是按照恩格斯所指出的规律，世界人民的革命力量，终于扑灭了不可一世的法西斯匪徒的暴力凶焰，希特勒等法西斯分子，已被历史前进的巨轮碾得粉身碎骨，“战国策派”这伙希特勒法西斯的走卒只得向隅而泣。

## 中华民族的败类

“战国策派”从他们法西斯政治的要求出发，拼命反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歪曲和篡改我国的历史，诋毁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对中国人民极尽诬蔑之能事。

第一，他们大肆宣扬个人的意志和作用，认为“天才可以创造规律”，人的主观意志可以支配历史。把历史上战争的胜负，国家的兴亡，朝代的更替等等，都说成是英雄伟人活动的结果。他们极其荒谬地说：“中国人所以能维持这多年的独立，拥有这样广大的国土，实在说就是靠了这无力圈中偶而起而成了大业的几个少数力人。幸得这几个力人，才把这群‘卫道’的无力人（人民群众）从异族侵略中拯救出来”。而且认为这些“英雄”“伟人”也是偶而凑巧出现的，所谓“直到几乎无救时，凑巧又有些力人兴起，来挽救这群可怜虫”。<sup>⑥</sup>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在阶级社会里又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人民群众不但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我们并不否认个别卓越领导人物的作用和影响。但这种作用和影响只是因为历史的重大变革时期，他们的行动适应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才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起了巨大作用。因此，卓越人物的作用，正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集中表现。

“战国策派”还别有用心地宣扬“天才”和“英雄”。他们认为“社会的进步，是要靠天才来领导”。<sup>⑦</sup>认为英雄“是社会上的先知先觉，出类拔萃的天才”。他们的结论是国家的一切领导工作，都应该由“英雄”、“伟人”去担当。因而他们十分强调“英雄应当受人崇拜”。说“一个不知崇拜英雄的时代，一定是文化堕落民族衰亡的时代”<sup>⑧</sup>。他们不仅是赤裸裸地宣扬资产阶级主观唯心史观，而且是最反动的法西斯叫嚣。希特勒曾利用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尼采的“超人哲学”，作为屠杀人类的理论依据。而“战国策派”也极力宣扬尼采的主张，接连发表了《尼采的哲学思想》、《尼采的政治思想》、

《尼采的无神论》等许多文章，和希特勒法西斯分子一样，把尼采的“唯意志论”和“超人哲学”捧得十分肉麻，还说尼采是“近代政治思想家中，最前进的、最革命的、最富于理想的政治思想家。”<sup>①</sup>“战国策派”在这里把他们的反动本质暴露无遗。

第二，他们大肆宣扬法西斯的种族主义理论，诬蔑中华民族是奴隶型的民族。他们说：“奴隶型的人，生来就是奴隶，因此也就并不感到压迫，并不感到威胁，心目中始终就无被威胁被压迫这个观念”。<sup>②</sup>他们拿这种反动理论来为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作辩护，以麻痹和毒害中国人民。不仅如此，他们还提出一个极其反动的所谓理论根据，即“遗传优劣论”。他们把社会上受压迫受剥削的广大人民群众看作是遗传性低劣者，而把压迫人民的统治者看作是遗传性优秀者；对国外，同样把侵略民族看作是优秀民族，把被压迫、被侵略民族看作是低劣民族。他们主张“改造社会的良方”，就要象园艺畜牧“择良留种”的方法那样，以“改良”人种。他们说：“要想把‘力’发扬光大，最要必从遗传入手。唯有这一条道才是基本大道，才是一劳永逸之举。所谓从遗传入手就是选择力人（即英雄豪杰），使他们多生殖，反之，无力人（即人民群众）当少生殖。如此，力人增多，无力人减少。这即是优生学的方法。优生学是以遗传研究为根据的一种社会改进方策。”<sup>③</sup>

他们从法西斯主义的政治要求出发，对劳动人民尽情地加以诬蔑，说什么“按人类生殖的一般趋势，人愈无用生殖愈多，低能儿之生儿育女的能力远超常人，生殖似乎是废人唯一的用处与长处”。他们把广大劳动人民称为“废人”，而且狠毒地提出“屠杀是一个简直了当的方法”，并且捏造了一个历史依据，说“民间历代都有‘劫’的观念，认为天下大乱是天命降劫收人。这种民间迷信实际含有至理”。<sup>④</sup>“战国策派”这种极

端仇视劳动人民的反动思想，直接为希特勒、蒋介石等法西斯匪徒屠杀千百万人民的法西斯暴行提供了理论依据。

我们知道“北京人”的发现，科学地证明了我们祖国土地上早在四、五十万年前就已经有了人类的代表（当时考古工作者还未发现距今约一百七十万年的元谋猿人），这有力的驳斥了帝国主义分子散布中国人种西来说、中国文化西来说的种种谬论。然而，大肆诬蔑中华民族为劣等民族的“战国策派”却说：“北京猿人发现之后，有些夸大习性未除的国人更欢喜欲狂，认为科学已证明中国历史可向上拉长几十万年。殊不知这种拔高的举动极为可笑”，“由史学的立场上来看，北京人的发现与一个古龙蛋的发现处于同等地位，与史学同样地毫不相干。”<sup>⑤</sup>可见他们这伙法西斯走卒，是一批实足的民族败类。

第三，他们恶毒地诋毁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优秀的文化传统，对中国人民极尽诬蔑之能事。帝国主义者为了达到其奴役我国人民的目的，不仅在经济上、军事上、政治上进行侵略；并且在文化方面，也进行着猖狂进攻，企图从根本上否定我们伟大祖国的历史，从精神上来涣散我们，企图使我们失掉民族自信心，解除我们反抗侵略者的思想武装，进而接受帝国主义者的统治。“战国策派”也正是如此，他们鄙视、厌恶祖国人民和祖国的历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们甚至无耻地自称是“在精神上没有祖先”和“没有祖国的人”。

远在千年之前，我国各族人民就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使我们祖国成为世界上文化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对东方以至全世界的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华民族不但以勤劳、智慧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我国各族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革命斗争精神和彪炳千秋的爱国事业，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光辉灿烂的

篇章。可是，在“战国策派”的眼睛里，中华民族却成了另外的样子，他们说：“中国民族圈儿里现在有若干千万浑浑噩噩的奴隶型的人在那里繁殖着”。不仅现在，而且“奴隶型的毒菌原来早就蔓延到我们全民族体。”<sup>⑩</sup>这是对中国人民极其恶毒的诬蔑。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从古到今，有许多杰出的科学家、思想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无论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各个专业，都有杰出的贡献。可是，所有这些“战国策派”一概视而不见，他们诬蔑说：“中国文化的精粹是中庸之道。是个颇属无力的一种文化型。这个中庸之道之所以存在，实也因为合了中国人大多数的胃口。”<sup>⑪</sup>他们对祖国历史上的伟大学者和伟大的著作也一一加以否定。如司马迁是大家公认的伟大历史学家，他所著的《史记》是我国古代一部优秀的史学著作。可是，“战国策派”却诬蔑“太史公是中国古代伟大史学消灭的象征。二千年来学术界对于司马迁的崇拜，正是二千年间中国没有史学的铁证。《史记》一书，根本谈不到哲学的眼光，更无所谓深刻的了解，只是一堆未消化的史料比较整齐的排列而已。此后的所谓史著，都逃不出此种格式，甚至连太史公比较清楚的条理也学不来。文化精神衰退的一泻千里真可惊人。”<sup>⑫</sup>

“战国策派”极力否定我国优秀文化的辉煌成就，其罪恶目的是企图使我们接受法西斯主义的文化，从精神上搞垮我们，进而

妄图摧毁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蓬勃发展的革命力量。他们大肆攻击“共产主义运动是一种宗教运动，本质上是排斥异己的”，“共产党与其说是一种政党，不如说是一个教会。……迟早必要招致一个内部分裂的命运。”<sup>⑬</sup>然而，历史的进程已彻底粉碎了“战国策派”的无耻谰言，汹涌澎湃的革命运动早已把这伙中华民族的败类，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 附注

- ① 林同济：《第三期的中国学术思潮》，《战国策》第14期
- ② 林同济、雷海宗：《文化形态史观》，1946年大东书局版
- ③ 1942年6月9日《解放日报》，《“战国”不应作法西斯宣传》
- ④ 林良同：《民主政治与战国时代》，《战国策》第15、16合期
- ⑤ 何永信：《政治观：外向与内向》，《战国策》创刊号
- ⑥ 何永信：《从大政治看宪政》，《战国策》第5期
- ⑦ 陈铨：《尼采的政治思想》，《战国策》第9期
- ⑧ 何永信：《希特勒的外交》，《战国策》第12期
- ⑨ 丁泽：《希特勒与朱元璋》，《战国策》第11期
- ⑩ 何永信：《龙虎斗》，《战国策》第10期
- ⑪ 林同济：《民族主义与二十世纪》，《战国》第29期
- ⑫ 洪思齐：《如果希特勒战胜》，《战国策》第5期
- ⑬ 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战国策》创刊号
- ⑭ 何永信：《论国力政治》，《战国策》第13期
- ⑮ 恩格斯：《反杜林论·暴力论》
- ⑯ 陶云逵：《力人》，《战国策》第13期
- ⑰ 陈铨：《尼采的思想》，《战国策》第7期
- ⑱ 陈铨：《再论英雄崇拜》，《战国》第21期
- ⑲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1940年商务版
- ⑳ 雷海宗：《历史警觉性的时限》，《战国策》第11期
- ㉑ 1948年8月23日《益世报》。

### · 简讯 ·

### 全国第一个教育科学实验研究中心在我院成立

全国第一个教育科学实验研究中心于六月九日在我院宣告成立。国务院原参事李逸三、四川省副省长康振黄、省委顾问委员会委员袁仲凡在成立大会上讲了话。

这个中心是在四川省委、省政府、省科委、高教局和全国侨联的关怀下成立的。研究中心由省内外三十名有关方面专家、学者组成。它的成立受到省内外知名人士的热忱关怀和支持。全国侨联主席张国基为中心题词：“弄潮造福”、“春草园”；著名书法家唐天际为中心书写了吊

牌。中心成立后，将通过开办教改实验班，着眼于儿童早期智力开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一代，进行从小到大的“一条龙”教育改革的综合实验。在中心成立后紧接着举行的为期五天的首次教学规划会议上，来自全国十多个省市的八十余名文学、美学、音乐、语言学、电子学、工程技术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就教育实施计划安排等问题开展了学术交流。

（邓奎金）